



导演处女作《六欲天》票房仅过百万

祖峰形容新作是“不完美的孩子”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电影是沟通,不能太简单

虽然导演处女作《六欲天》迄今票房仅过百万元,但祖峰仍然感恩能拍一部令自己有表达欲望的作品。近日,广州中影国际影城(中船汇店)举办开业典礼,祖峰的《六欲天》被影院选作招待首批观众的影片。这或许是继《六欲天》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后的又一个高光时刻,祖峰本人也郑重出席。

在祖峰看来,一部电影更重要的并不是两个小时的“热闹”,“多少还是得跟观众聊点什么”。他说《六欲天》就像自己的孩子,“不完美,但我仍然爱它”。与他同来广州的制片人李锐至今仍认为,让祖峰来执导《六欲天》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祖峰作为导演是合格的,他表达的有些东西很超前,观众现在可能不理解,但未来肯定会认可他。”



《六欲天》艺术水准获认可

“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用一段时间的得失来评价它。拍电影的人都是为了流传下一些东西。”当天跟祖峰一起来广州的《六欲天》制片人李锐认为,不论该片商业表现如何,艺术魅力都是毋庸置疑的。他说:“商业片我不太懂,但作为一部艺术片它入围戛纳电影节,肯定是质量过硬的。”他甚至提到了前阵子批评“漫威电影不是电影”的马丁·斯科塞斯,认为《六欲天》“可能不够娱乐,但确实是符合马丁·斯科塞斯定义的那种电影”。

相比李锐,祖峰本人似乎并不太在意外界对于影片商业得失的评价。他说:“我们是讲故事的人,也是爱看故事的人。我不喜欢那种特别热闹的电影——两个小时呢,就这些东西,会不会简单了一点?破案惊悚悬疑片也是一样,如果只拍这些,那不过是创作者在跟观众做一个猜谜游戏,太简单了一点。电影还是应该多少跟观众聊点话题,让两个小时成为我们跟观众沟通的过程。起码,我是这么想的。”

不光我选它,它也选了我

突然当导演,并不是因为感受到什么做演员的“限制”,祖峰称此事为缘分:“不光我选了这个故事,它也选了我。”祖峰说,这个故事来自一个学生的毕业剧本,最早被他的太太刘天池发现,“她看完觉得很好,而且男主角很适合我来演”。再后来,李锐买下了版权,在沟通探讨的过程中,他发现祖峰已经把这个戏怎么拍想得很透彻了。于是,李锐和刘天池都劝他亲自执导。

祖峰刚开始是犹豫的:“我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本职工作是演员,虽然演员

当导演这件事比较时髦,但我不是一个喜欢赶时髦的人。我的性格也不太爱跟别人交流,要跟那么多部门和人去交流,花那么多时间在事务性事情上,对我来说太难了。”但这个挑战,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因为这个故事让他确实很有表达欲。

而李锐则惊讶地发现,祖峰在片场颇具统帅能力:“中国导演90%都会在片场骂人,但祖峰不会。他懂得跟人沟通,因为他有很丰富的表演经验和片场经验,他能让整个拍戏的过程很顺畅。”

也曾抑郁过,没啥不能说

《六欲天》是一个关于抑郁症的故事,祖峰饰演的警察得了抑郁症,他遇到的受害者家属也得了抑郁症,而两个灵魂因此慢慢接近。祖峰说,早在拍片前就对抑郁症有一定认知:“身边有人患上抑郁症,也听说过朋友的朋友因为这个病离开人世。我前两年也有过低落的时候,虽然不到抑郁症的程度,但也体验过抑郁的情绪。”

祖峰觉得,抑郁症不是什么不能启齿之事:“人都是情绪的动物。如果太超脱了,跟木头似的,那还有什么意思?

这也是一种人生的美丽。”他发现,很多人得了抑郁症只敢偷偷摸摸去看心理医生,害怕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异类:“我很想用这部电影告诉大家,你大可正大光明地去,抑郁症没什么可丢人的。”

或许因为这个立意,影片走的是“一个人的内心战争”的路子。他透露,原本的剧本结局较为沉重,但开拍前,他在结局中加了一些光明的正能量,希望以此影响那些沉浸在痛苦中的人,“跟过去忘不掉的经历握手言和,而不是一味逃避”。

演戏这件事,不能连着干

祖峰发现,做了导演之后,他对电影的理解更有全局观了:“如果单纯做演员,你会长时间沉浸在一个角色里,可能拍完之后还需要一段时间缓解自己的心情。但做导演,你在拍的过程中就得不断跳出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考虑方方面面。你不会注重绽放个人的魅力,因为无论你怎么演,一部电影整体好不好看才是最重要的。”

祖峰并没有把这次尝试看作是自己“导演生涯”的开始:“这次运气比较好,得到了一个好剧本,下次拍不拍看缘分吧。我的本职工作是演员,这份工作的单纯还是挺吸引我的。如果哪天碰到一个抑制不住想跟大家讲的故事,我可能还会当导演。”

对于演戏,他的态度跟做导演一样“不着急”。“演戏这件事,最关键的是不能连着干。如果太密集地拍,创作力会被消磨掉,最终找不出人物之间的差别。得先把之前塑造的那个灵魂释放掉,你才能去创造第二个。”



祖峰扮演一名患有抑郁症的警察



凯奇演“烂片王”拿自己开涮

因为出演了太多烂片而沦为“烂片之王”的尼古拉斯·凯奇,这次要用一部《天才不能承受之重》来证明自己——凯奇要在影片中扮演自己,一个名叫“尼古拉斯·凯奇”的演员。

影片中的凯奇在上世纪90年代也是响当当的大明星,自负、傲慢又任性,而如今却早已过气,还债务缠身。一方面,他想在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新片中谋到一个角色,另一方面,他还要处理和青春期女儿之间日渐疏远的关系。为了偿还债务,他不得不参加了一个墨西哥亿万富翁的生日派对。这名富翁是凯奇的粉丝,邀请偶像前来一个目的就是展现自己创作的剧本。

接下来的剧情朝着黑色喜剧发展,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告知凯奇,这个亿万富翁是一个大毒枭,还绑架了墨西哥总统候选人的女儿。CIA招募凯奇作为线人,让他通过与亿万富翁的联系来获取情报。大毒枭对凯奇是真爱,为了偶像,他还特地找来了凯奇的前妻和女儿,希望三人能重归于好。

片中一个好玩的设置是,当下的凯奇会不时和大明星时期的凯奇对话。“明星凯奇”会吐槽“落魄凯奇”演了太多烂片,才会沦落成这个样子。

影片的许多桥段致敬了凯奇以往的作品,如《变脸》《离开拉斯维加斯》《极速60秒》等。这个有趣的剧本由《活宝斗恶鬼》编剧汤姆·戈米肯和凯文·埃顿创作。这是两人创作的一个样品剧本,希望借此推自己,谋求转型。没想到,许多人对此表达了浓厚的投资兴趣。后来,凯奇也收到了这个剧本,随剧本附上的还有汤姆·戈米肯的一封信。汤姆·戈米肯在信中表示,这个故事是向凯奇致敬的一封信,而不是想取笑他。凯奇被他说服,几周后答应亲自出演。

这个项目引来了不少买家,包括狮门、HBO Max和派拉蒙,目前狮门已经进入最终协商阶段,最有可能拿下该片。(邵梓恒)



风靡世界的自然教育如何落地中国?

自然教育≠占山为王 身边一草一木都是教材

文/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德国模式:小而“简陋”,项目学习为主

目前全世界拥有自然与森林幼儿园最多的国家是德国,约1500所。从1968年到如今,德国的自然与森林幼儿园经历了长足发展,从教育理论到实践都非常成熟。

一个德国的自然森林幼儿园如果开到中国,大概会收不上学生、赚不到钱。

一是小,整个学校一般15-20个孩子。德国最大的森林幼儿园也才120人,分布在城市的8个营区,孩子可以每天选不同的自然环境去上学。

二是“简陋”。森林幼儿园并不要求有固定的房舍,野外搭个小棚子或有辆应急车,称之为“庇护所”,提供避险功能,就是一所幼儿园了。

三是自由。每天8:30家长把孩子送到集合地点,十几个小萝卜头在老师带领下就开始往森林里走。在德国深入调研过森林教育的北京学前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ICEE国际儿童生态教育

机构创始人马琳琳说:“也许今天的教学目标是昆虫研究,但很可能走到中午12点都没到研究昆虫的地方,因为孩子走着走着发现了别的好玩的,大家就凑在一起研究。”所以,教育一直在路上,这种模式需要老师具备非常强的项目教学思维方式,把孩子的探索跟日常教学结合在一起。

四是艰苦。在德国幼儿园的字典里,就没有“坏天气”这个词,在他们看来,任何天气都是不同的体验,即便风雨交加、大雪纷飞,也不能阻挡幼儿们探索的脚步,只是做好各种应急避险措施。

此外,德国的自然幼儿园并不只与森林元素相关,而是开在各种自然场景之中,例如农场、海滩等。

森林幼儿园仅仅是带孩子到自然中走马观花的游戏?当然不是。马琳琳介绍,例如图林根州的幼儿园教学大纲对教学范围的规定有:语言与写作教

育、体育健康教育、自然科学常识及艺术教育、数学教育、音乐教育、美术教育、社会文化、道德伦理及宗教教育等多个发展方面,森林幼儿园都会涉及。

孩子们到了自然环境之后,除了自由探索之外,老师也会把预设的部分课程切入进来,通过集体讨论、小组探索、围圈唱歌等开展教学项目。

自然森林幼儿园的教学主要有三个重点:环境教育、自然教育、关注儿童的可持续发展。

德国关于自然和森林教育的教学体系非常的多,根据孩子的年龄和机构的特质,进行多元化组合。例如,自然游戏教学法,将游戏教学和戏剧教学结合在一起,通过体验-游戏-手工的流程,帮助孩子完成对自然现象的探索 and 发现;荒野教学法,倡导活动都回归到原始人的生活状态,教孩子射箭、磨面粉、如何在没有化工原料的基础上把食物做熟等方式。

调查:
一二线城市
公众爱户外运动

论坛现场发布了由北京大学吕植教授团队撰写的《2019年中国自然教育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自然教育发展呈现日渐成熟的趋势,公众对自然教育的认知度达到60%以上;94%的一线城市和88%的二线城市受访者至少每月一次到大自然中活动。

一线城市受访者最喜欢的活动是:观察野外动植物(48%)、户外运动(跑步、球类活动等)(46%)、参观动物园/动物救护中心(45%)。二线城市受访者最喜欢的活动是参观植物园(53%)、自然摄影(51%)、观察野外的动植物(47%)。

对于那些一周至少参加一次户外活动的“积极”人群中,最受欢迎的活动是户外探险类,如攀岩(47%);其次是工艺手工类(45%)、大自然体验类:体验自然生活(44%)。

报告指出,受访者对其自身和其子女接触自然的必要性普遍非常重视,超过九成的受访者至少一个月参与一次户外活动。

但是,公众的买单意愿不算强,68%的受访者认为单个自然活动合理的日均花费应在100-300元。意味着对于自然教育机构来说,生存和盈利仍然困难较大。

疑问:人工智能时代,还需要自然教育吗?

世界上第一所自然与森林幼儿园于1952年出现在丹麦,国际对于自然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已经超过半个世纪,近年来,自然教育理念也走入中国。

自然教育是什么?为什么需要自然教育?未来都高科技、人工智能了,还需要自然教育吗?

“自然教育”是以自然环境为背景,以人类为媒介,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使儿童融入大自然,通过系统的手段,实现儿童对自然信息的有

效采集、整理、编织,形成社会生活有效逻辑思维的教育过程。

德国心理分析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说过,儿童需要玩伴——譬如动物,更需要自然:水、泥巴、树丛、空地。

神经生理学研究显示,在大自然中活动可以激起各种兴奋,传导到大脑,产生出运动和行为的反馈;在大自然中获得经验的儿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意识水平、运动技能、社会技能、语言能力、创造力、数学和科学知识都表现优异。

最近半年,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教授庞静每周六在沙湖公园免费教小学生种地,“不教不知道,一教吓一跳”——不少10后学生,直到上了这种“补习班”才第一次知道,蔬菜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不是“从超市来的”。

除了劳动,庞静还准备了很多小游戏,让小孩边玩游戏,边学习生态学的知识。庞静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孩子能够自己感受大自然神奇、美丽的地方,让他们对大自然产生感情。”

武汉模式:“公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

11月初,中国首个自然教育周在武汉举行,“武汉模式”受到国内外专家关注。

武汉公园大课堂发起人、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处处长唐闻介绍,武汉2016年开始在龟山公园推出“公园大课堂”,先后开启植物导师、植物医生、昆虫夏令营等自然教育课程,至今累计开讲2000余场,3万个家庭参与其中。

去年以来,武汉市探索了“公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自然教育模式。武汉32座城市公园、100多个绿色

驿站开放成为中小学生自然研学基地,创新举办中小学生自然笔记大赛和自然生态研学等活动,邀请超百名学生成为小湖长、小树长、小园长,这些新颖的自然教育活动带动了120多万名学生和市民广泛参与。

2019年,武汉自然教育扩容,从城市公园延展至大大小小的自然空间及生活日常场景,构建城市绿地系统五园两区+校园、社区等多层次、立体化的自然教育全阵地。教育对象也从青少年扩展至社区居民、市民。



受访者供图